从“反哺”到“桥梁”：新加坡华人华侨对中国社会发展贡献的历史考察

管浩然*
日本静冈产业大学

摘要

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放在静态的“贡献”-“受惠”结构中进行叙述，而很少追问这种贡献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以 1819 年新加坡开埠以来移居当地的华人及其后裔作为考察对象，并借助海外华人研究中的认同类型学，结合跨国主义的分析视角，从而对新加坡华人华侨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新加坡华人对中国的贡献经历了一次结构性的转变：在“落叶归根”的侨民认同下，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通过经济投资、政治动员以及教育兴学的方式来直接介入祖国事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新马华人对国家认同的转向，华人从以侨民身份来直接参与中国建设，转变为通过语言、文化与商业网络，在新加坡与中国之间扮演着桥梁与中介的角色。贡献的主体由华侨个人转变为以华人为主体族群的新加坡，贡献的方式也由单向的“供给”变为双向的“互惠”。这一转变，既折射出二战后东南亚的国际秩序与族群政治生态的重组，也为理解华人华侨与祖国关系的动态性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认同转型、陈嘉庚、李光耀、中新关系

* 管浩然，博士，现任职于日本静冈产业大学。电邮：k-kan@ssu.ac.jp

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第十四卷，第一期，2026 年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4, No. 1 (2026)

From “Giving Back” to “Bridging”: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Singapore’s Overseas and Ethnic Chinese to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Guan Haoran
Shizuoka Sangyo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fra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 within a static structure of “contribution” and “benefit,” seldom asking how such contributions changed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Taking as its subject the Chinese who settled in Singapore after the port’s founding in 1819 and their descendants,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typology of identity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ism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rough which Singapore’s Chinese took part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ir contributions underwent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a sojourner identity oriented toward “returning to one’s roots” (*luoye guigen*), overseas Chinese represented by Tan Kah Kee intervened directly in the affairs of their homeland through economic investmen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school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shifted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they moved from participating directly in China’s development as sojourners to serving as bridges and intermediaries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through language, culture, and business networks. The agent of contribution shifted from individual overseas Chinese to Singapore, a state with an ethnic Chinese majority, and the mode of contribution changed from one-way “giving” to two-way “reciprocity.”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of ethnic politics in post-war Southeast Asia, and offers a representative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and ethnic Chinese and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Keywords: Singaporean Chines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an Kah Kee, Lee Kuan Yew, China–Singapore relations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几乎与中国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同样悠久。东南沿海居民泛海南下的记录，至迟在汉代的文献中已可寻得踪迹。在为数众多的移居目的地之中，新加坡所处的位置颇为特殊：它处于马六甲海峡的南口，自 1819 年开埠以后，迅速成长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并吸引了闽粤沿海的大批移民；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以后，它又成为东南亚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体族群的主权国家。一百多年间，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侨乡建设到新中国的外交格局，新加坡华人华侨的身影几乎出现在了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

然而，“新加坡华人华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一命题本身，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贡献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经由何种组织与渠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否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这些形态的变化又受制于怎样的历史条件？只有把“贡献”从带有颂扬性的叙述对象转化为分析性的研究对象，这一命题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学术意义。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对新加坡华人华侨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作长时段的考察，并尝试解释其形态演变的内在逻辑。

（二）先行研究

围绕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通史与政策层面的研究。朱杰勤（1990，2011）的《东南亚华侨史》《华侨史》描述了华人移居东南亚及南洋华侨社会形成的基本轮廓；庄国土（2001）《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梳理了自明清两代至改革开放时期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演变。孔飞力（Philip A. Kuhn, 2008/2016）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则是把近五百年的中国移民史置于移民与环境互动的框架之中，提示研究者们要注意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与流动性。

其二，是新马华人社会与认同层面的研究。王赓武提出，应当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等不同层次来理解海外华人的认同结构（王赓武，1994）。颜清湟（Yen Ching-hwang）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新马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Yen, 1982）；崔贵强论证了 1945-1959 年间新马华人由中国认同向当地认同的转向过程（崔贵强，1989）；曾玲（2003）、刘宏（2003）则分别从社会文化与跨国网络的视角，深化了学界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结构及其与区域世界联系的理解。

其三，是个案与双边关系层面的研究。杨进发（C. F. Yong, 1987）的陈嘉庚传记，迄今仍是海外学界研究这一人物的奠基之作；杨国桢（1987）《陈嘉庚传》代表了大陆学界的系统成果；陈达（2011）对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关系的实证考察，至今仍是侨乡研究难以绕开的经典。在中新关系方面，凌翔、陈轩

（1998）的《李光耀传》以及艾利森等人（2013）整理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保存了诸多李光耀处理对华关系的一手言论。

就总体格局而言，通史性的成果长于对宏观的梳理而疏于对机制的分析，认同研究聚焦华人社会内部而较少回应华人社会与中国的互动，个案研究则多止步于人物行谊的论述。换言之，很少有研究将“贡献”本身作为分析对象，追问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形态差异与生成条件。因此，本论文以认同转型为线索，将新加坡华人华侨对中国的贡献区分为“侨民反哺”与“族裔桥梁”两种历史形态，并解释二者之间转换的原因所在。

（三）分析视角、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本文在分析上主要借助两组概念。第一，是王赓武（1994）的认同类型学：海外华人的认同并非单一均质的整体，国家认同、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可以在同一个体身上交错并存，其相对权重随历史环境而消长。其二，是“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这一对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概括：前者指向以返回祖国为归宿的侨民心态，后者指向以移居地为家园的在地化心态。本文并不是将二者视为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而是将其作为两种历史地形成的生存策略与认同类型，从而来刻画不同时期新加坡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结构差异。

与此同时，本文对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保持有限的借用。跨国主义是强调移民群体在移居国与祖籍国之间持续维系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联系，对解释当代海外华人的网络活动具有一定的启发；但对于冷战时期跨国联系一度中断的历史段落，这一概念的适用性需要打上折扣。因此，本文始终将其限定为描述性的分析工具，而非普遍性的解释框架。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历史文献分析为主，并以历史比较与个案研究为辅，所用材料包括中文古典文献、回忆录、传记、政府档案与统计资料等。论文结构上，第二部分界定核心概念并梳理历史背景；第三部分考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形成过程；第四部分以陈嘉庚为中心，分析“落叶归根”认同支配下的反哺形态；第五部分讨论二战以后认同转向背景下贡献形态的转型；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概念界定与历史背景

（一）“华人”与“华侨”的概念

从语源上看，“侨”字的本义是“高”。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曰：“侨，高也。侨与乔义略同”，其后方引申出“寄客”，即寄居他乡之义[1]；《康熙字典》“旅寓曰侨居”的说明，与此一脉相承[2]。就现代法律概念而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外籍华人”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3]。

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年代跨度远超上述规定的生效年份，若只是机械性套用现行的定义，反而会造成时代错置。因此，本文对“华人”“华侨”作如下操作化界定：凡先祖或本人为出身于中国的移民及其后裔，一概以“华人”称之；其中仍保留中国国籍、或以中国为政治认同归属者，则称为“华侨”。在下文的论述中，二者的分野恰恰构成分析的主线。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新加坡华人大多自视为“华侨”，而此后的新加坡华人则完成了向所在国公民的转变。

（二）前近代中国与南洋的人员往来

中国人移居海外，其缘由包括了躲避战乱、逃避劳役等被动性因素，也包括了传播宗教、发展贸易等主动性因素。如果将焦点放在东南亚地区的话，在汉代就已可寻得中国居民南移的踪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记载：“朱吾县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县民汉时不堪二千石长吏调求，引屈都乾为国”。文中的“屈都乾”即马来语“Kuala Dungun”之音译，相当于今马来西亚登嘉楼州龙运地区（郦道元，2007，卷三十六）。又如唐代高僧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僧人怀业“投命溟渤，至佛逝国。解骨仑语，颇学梵书……恋居佛逝不返番禺”，文中“佛逝”即室利佛逝，为七至十三世纪存在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一带的南海强国（义净，1988，卷下）。

直接提及新加坡的文献记录亦不少见。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龙牙门”条记载：“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门中有水道以间之。……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稍”（汪大渊，1981）。其中的“单马锡”，在满者伯夷宫廷诗人普腊班扎 1365 年所撰《爪哇史颂》中写作“Tumasik”[4]，在明代茅

[1] 据《说文解字注》记载，“侨，高也。侨与乔义略同。乔者、高而曲也。自用为寓寓字。而侨之本义废矣。字林始有寓字。云寄客为寓”（许慎，1988）。
[2] 据《康熙字典》子集中人部记载，“旅寓曰侨居”。
[3]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官方网站（www.chinaql.org）所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
[4] 《爪哇史颂》第十四章第二节所列地名中有“单马锡”。中文版译者将其注解为“Tumasik，也作淡马锡，即新加坡”。参见普腊班扎（2016）。

元仪《武备志》所收《郑和航海图》中则记为“淡马锡”[5]，均为马来语“Temasek”之音译，义为“海城”，即新加坡之旧称。马来文献《马来纪年》亦有中国国王遣公主汉丽宝（Hong Li-po）率五百侍女远赴马六甲、苏丹满速沙（Sultan Mansur Shah）特赐山丘供其居住的记载。如今的马六甲三宝山（Bukit China）上的华人墓群与宝山亭，仍可视为这段交往史的见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记录所反映的人员往来，多依托朝贡、贸易与宗教求法的框架展开，规模有限，并且未形成稳定的常住社群。这与十九世纪以后以谋生为目的的大规模移民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前近代的南洋中国人是贸易网络中的流动人口，近代以后的新加坡华人则逐渐聚合成具有帮群组织、教育事业与报刊舆论的定居社会。因此，本文将正式考察的起点设定在 1819 年新加坡开埠之后，前近代文献仅作为长时段的背景参考。

（三）新加坡的地理、人口与近代简史

新加坡，全称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其国名源自于梵语的“Simhapura”，其中“simha”为狮子，“pura”为城市，故新加坡又称“狮城”。新加坡位于中南半岛最南端、马六甲海峡南部之要冲，由新加坡岛及周边共 63 个岛屿组成，国土面积约 735.2 平方公里[6]。总人口约 592 万，在居民人口中，华人约占 75.9%，马来人约占 15.0%，印度人约占 7.5%，其他族群约占 1.6%[7]，是东南亚唯一以华人为主体族群的国家。

中国文献中关于新加坡的最早记载，一般追溯到三国时期吴国康泰所著《吴时外国传》，书中两处提及“蒲罗中国”[8]。据新加坡学者许云樵考证，“蒲罗中”与马来语“Pulau Ujong”（义为“尽头之岛”）相对应，与新加坡岛位于中南半岛最南端的地理事实相符。此后，新加坡先后处于三佛齐、满者伯夷、马六甲、柔佛等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内。1819 年，英国人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登陆新加坡，建立贸易港口；1824 年《英荷条约》签订，荷兰承认英国对新加坡的占领[9]，新加坡自此进入英属时期。1942 年，驻新加坡英军司令白思华（Arthur Percival）向日军投降，新加坡进入日占时期并被改称“昭南岛”[10]，直至 1945 年日本战败。战后英国势力重返新加坡，1959 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63 年与马来亚、沙巴、

[5] 见于《武备志》卷二百四十所载航海图（亦称《郑和航海图》），“淡马锡”被描绘于满剌加（即马六甲）与龙牙门之间。
[6] 参考新加坡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ingstat.gov.sg）公布的数据。
[7] 数据来源：Census of Population 202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该统计口径为新加坡居民人口（公民与永久居民）。
[8] 《吴时外国传》一书于宋代以后散佚，其文现仅存于各种典籍之引文。上引两段参见康泰（1971）。关于“蒲罗中”与“Pulau Ujong”对应关系的考证，亦出自许云樵氏。
[9] 见于《英荷条约》第十二条，原文：“ARTICLE XII. His Netherland Majesty withdraws the objections which have been made to the occupation of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by the Subjects of His British Majesty”。
[10] “昭南岛”一词通常被理解为“在日本昭和年间（1926—1989）所获得的南方之岛”。

砂拉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其后，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与族群矛盾的激化[11]，新加坡于 1965 年 8 月 9 日退出联邦，宣布独立。对于这次独立，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它是“强加”在新加坡头上的[12]。独立后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韩国、台湾、香港并称“亚洲四小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三、港市的兴起与华人社会的形成

（一）自由港体制与华人移民潮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形成，需要在十九世纪全球贸易格局变动的背景中加以理解。瓦特改良蒸汽机以后，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张，蒸汽动力商船逐步取代帆船，海上运输的成本与周期大幅下降；1869 年苏伊士运河竣工通航，欧洲与东亚之间的航程进一步缩短。地处两大航道交汇之处的新加坡，凭借自由港政策，在开埠之后不久便超越马六甲，成长为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转口贸易港。

港市经济的扩张产生了持续的劳动力需求，新加坡由此吸引了来自亚洲各地的移民。移民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新加坡周边地区的商人，包括中国本土与马六甲的华人、马来半岛各地的马来人、苏拉威西南部的布吉人以及中东的阿拉伯人；其二是体力劳动者，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被称为“苦力”的华工，主要在港口与船舶上从事货物装卸等重体力劳动。

关于开埠后华人社群的规模，清末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留下了一定的记录。据其所引 1881 年英殖民政府的户口册，当年旅居新加坡的华人共约八万七千人，其中以福建籍最多，约占百分之二十九，其后依次为潮州、广州、琼州与嘉应州籍[13]。这一籍贯构成奠定了此后新加坡华人社会“帮群林立”的基本格局，也解释了为何日后讲华语运动要以消除方言隔阂为目标。

[11] 1964 年 7 月 21 日及 9 月 2 日，新加坡华人社群与马来人社群之间先后发生两起种族冲突骚乱，造成人员伤亡。

[12] 李光耀（2000）。原文：“一些国家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

[13] 《新嘉坡风土记》中涉及户口部分的原文如下：“华人住坡户口最难详确。查光绪七年英人所刊户口册云：福建男女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广州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应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琼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长之华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华人二百七十二名，统计八万六千六十六人（笔者注：原文有误，实际合计应为八万六千七百六十六人）。近五六年来，虽少有参差，总在八九万之间，而历来居叻游叻者，动称十余万，皆约略之词，虽西人所报未必尽确，不列籍者不止此数，然总不过十万人”。参见李钟珏（1947）。

（二）从苦力到华商：华人经济的成长

移民至新加坡的华人，最初多经营小规模贸易，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逐渐发展出大型集团公司，并集中于三类产业。第一类是橡胶业。随着马来亚橡胶种植业的发展，陈嘉庚、李光前等华商相继建立起从种植、加工到制造的一体化经营体系[14]。第二类是国际贸易。华商承担着新加坡与雅加达、曼谷、马尼拉等东南亚港市之间，以及新加坡与香港等中国口岸之间的商品流通。第三类是银行业。橡胶业与国际贸易积累的资金转而进入金融领域，李光前参与创办的华侨银行（1932 年）[15]与黄庆昌创办的大华银行（1935 年），至今仍是东南亚金融业的重要机构。

从本文的分析视角看，华人经济的成长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使跨国的资金流动具备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依托方言社群与地缘纽带形成的帮群组织、会馆与商会，为此后的政治动员提供了组织网络。换言之，到二十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已经具备了“反哺”祖国所需的资金与组织两项前提。但经济基础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对祖国的实际参与。促成这种转化的，是侨民认同的政治化过程。这正是下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四、“落叶归根”：侨民认同下的祖国反哺——以陈嘉庚为中心

（一）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

在英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殖民政府不允许华人参与政治活动；而旅居当地的华人也大多将新加坡视为经商、务工的临时住所，而非永久家园。在这样的双重条件之下，中国始终是新加坡华人政治认同的归属。颜清湟的研究表明，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保皇派与革命党相继在新马展开活动，华侨民族主义逐渐成型（Yen, 1982）；庄国土指出，1911-1941 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的认同经历了由民族主义向爱国主义的演变（庄国土，2000）。每当中国发生重大政治危机，譬如 1915 年的“二十一条”、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 年的全面侵华战争等，新加坡华人对祖国的关怀便被激发为实际的动员。

陈嘉庚（1874-1961）的一生，恰好贯穿了这一过程。陈嘉庚字科次，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区）[16]。其父陈杞柏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南渡新加坡，创立顺安米店，兼营黄梨种植与罐头制造[17]。1891 年，十七岁

[14] 陈嘉庚，福建同安人，1891 年赴新加坡；李光前，福建南安人，1903 年赴新加坡，为陈嘉庚之女婿。
[15] 华侨银行由 1912 年创办的华商银行、1917 年创办的和丰银行、1919 年创办的旧华侨银行三家银行于 1932 年合并而成。
[16] 据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之“未成人经过记载”：“余生于福建泉州同安县集美社，与厦门岛仅隔十馀里海港”。
[17] 参考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www.jimei.gov.cn）所载陈杞柏生平资料。

的陈嘉庚出洋随父学商[18]；1906 年，他向马六甲华人陈齐贤购买橡胶种子，创办橡胶园与橡胶制品厂[19]，逐步建立起横跨种植、制造与贸易的企业体系。1909 年，陈嘉庚结识孙中山，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位于新加坡马里士他大人路 12 号的晚晴园（今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正是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在新加坡的活动据点。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陈嘉庚被推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接济闽省[20]。

（二）救国运动中的筹赈与慰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一个月，陈嘉庚即主持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继而赴吉隆坡主持马来亚各区筹赈会议。1938 年 10 月，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南洋华侨的救国动员由此被纳入统一的组织框架。1939 年，南侨总会应祖国之需，先后组织三千二百余名华侨司机与修理技工回国服务，远赴滇缅公路承担抗战物资运输任务，史称“南侨机工”（林少川，1994）。

除募捐之外，陈嘉庚还于 1940 年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奔走于中国各地。此行历时数月，先后在重庆与国民政府高层会面，继而又北上延安，与朱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话[21]。陈嘉庚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曾数度造访其寓所，或共进午餐，或同进晚餐。陈嘉庚向毛泽东表达了全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最后胜利的期望，同时也流露出对国共两党恶感日深、恐难免一战的忧虑；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则是“虚怀若谷”。这次考察使陈嘉庚对中国政治格局的判断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其战后的政治选择埋下了伏笔。

（三）教育反哺与侨乡建设

南洋华侨对祖国的回馈，并不止于战时的政治动员，更体现在侨乡日常的经济与社会建设之中。陈达对闽粤侨乡的实证研究表明，近代厦门的四明戏院、地产公司、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电话公司与银行，多由华侨资本创办[22]；在汕头，华侨创办了自来水公司、电灯厂、永安堂、利生火柴厂等企业；漳厦铁道、

[18]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十七岁秋始出洋来新加坡，在家君所营顺安号米店学商业”。

[19] 陈齐贤（1870-1916），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东部），出生于马六甲，为马来亚橡胶种植业的先驱人物，曾创立马六甲橡胶种植公司。

[20] 陈嘉庚（2022）《南侨回忆录》“闽省光复与南洋华侨”条：“住坡闽侨乃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组织保安会，举余为正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月馀之间，计汇去二十馀万元”。

[21] 陈嘉庚（2022）《南侨回忆录》相关条目记载：1940 年 3 月 15 日，陈嘉庚搭乘英国邮船启程；26 日抵达重庆；28 日与蒋介石夫妇会面，其后数日先后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行政院长孔祥熙、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诚、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孙科等人会面；5 月 24 日抵达西安，次日与朱德会面；5 月 31 日抵达延安，次日与毛泽东会面。

[22] 陈达（2011）《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二编“社会变迁的一个原素：移民的影响”中记载：“四明路有华侨办的四明戏院，计建造费 10 万余元，规模宏大，设备完全，为厦门最华丽最舒畅的电影院”，即今厦门市思明电影院之前身。

潮汕铁道、汕樟轻便铁道等近代交通事业，亦多仰赖于南洋华侨的投资[23]。这些建设使侨乡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早接触近代市政与工业文明的地区之一。

在众多回馈形式之中，陈嘉庚对教育的投入最具制度化色彩。1913 年春，他回乡创办集美小学，其后，逐年添办师范、中学、女师、幼稚师范、商科与水产航海学校，逐步形成覆盖各学段的集美学校体系；1921 年 4 月 6 日，厦门大学借集美校舍正式开幕[24]；1937 年，陈嘉庚将厦门大学献给政府，改为国立。与此同时，他在新加坡亦参与捐办星洲大学、兴办南洋华侨中学，对当地的华文教育也做出了贡献。教育反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资金转移，而是把近代学校的制度、课程与师资“移植”回祖国，其影响比一般的赈济更为深远。

（四）从捐资到参政：反哺模式的顶点

1949 年 9 月，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同年 10 月 1 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此后定居集美，参政议政，直至 1961 年逝世。华侨与祖国的关系，至此由“捐资”“声援”上升为政治参与，反哺模式也达到了它的顶点。1945 年，毛泽东赞誉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3 年，邓小平题写“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2000 年，时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的习近平提出弘扬“嘉庚精神”[25]。今天，厦门集美建有陈嘉庚纪念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编号 2963 的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新加坡地铁滨海市区线亦设有“陈嘉庚站”，中新两国以各自的方式纪念着这位侨领。

回看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人对祖国的反哺可以归纳为三个相互支撑的环节：以侨汇与投资为内容的经济支持，以筹赈与舆论为形式的政治声援，以兴办学校为路径的教育扶植。这一模式依赖着两项历史条件：其一，是华人普遍保有“落叶归根”的侨民认同，视中国为政治与情感的归宿；其二，是殖民地时期人员与资金的跨国流动大体自由。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两项条件相继消失，反哺模式也就走到了转型的关口。

[23] 陈达（2011）。据该书记载，漳厦铁道自厦门岛对面的嵩屿镇起，至漳州城止；潮汕铁道自潮州西门外起，至汕头止；汕樟轻便铁道自汕头起，至樟林镇止。
[24] 陈嘉庚（2022）《南侨回忆录》“厦大假集美开幕”条：“时厦门厦大校舍未建，拟假集美校舍开幕。民国十年四月六日，厦大在集美正式开幕”。
[25]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2020）《习近平在厦门》中“习总书记对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情有独钟”篇。

五、“落地生根”：认同转向与贡献模式的转型

（一）国家认同的在地化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南亚进入去殖民化进程，新马华人的认同结构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崔贵强的研究表明，1945-1959 年间，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一个由中国认同向当地认同的转向过程（崔贵强，1989）。1955 年，中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放弃双重国籍政策，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华侨”作为一种法律身份由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59 年新加坡取得自治，1963 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 年又被迫独立建国[26]。在这一连串变动之中，新加坡华人的政治归属完成了从“中国”到“新加坡”的转移，也就是从“落叶归根”转换成为“落地生根”。

认同转向带来一个直接的理论后果：对华贡献的主体发生了置换。此前，贡献的行为者是自视为“华侨”的个人与社群；此后，行为者变成以华人为主体族群的主权国家及其公民。贡献的渠道也由跨越国境的私人网络，转变为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因素的退场，反而，共享的语言与文化的资本，使新加坡在诸多对华议题上扮演了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角色。这一转变的具体机制，可以从语言政策与中新合作两个层面加以观察。

（二）语言政策与文化桥梁的建构

李光耀（1923-2015）的个人经历，本身就是认同转型的一个缩影。其曾祖父李沐文为广东大埔客家人，十九世纪中叶自汕头南渡至新加坡。李光耀幼年接受全英文教育，1936 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莱佛士书院[27]；日占时期，他曾在日军的“检证”行动中死里逃生[28]；二战后赴英留学，先在伦敦经济学院接触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29]，后转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54 年，李光耀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走上了职业政治家的道路。

新加坡建国以后，李光耀政府确立了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与英语并列为官方语言的多语政策。英语被赋予了行政与经贸通用语的地位，对此，李光耀的

[26] 李光耀（2000）。原文：“我从来没这么悲伤过。分家成了事实，我辜负了马来亚、沙巴和砂劳越的许许多多人。……内疚使我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刻。”

[27] 该校由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于 1823 年 6 月 5 日创办，原名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1868 年为纪念莱佛士而更名为莱佛士书院。

[28] 李光耀（1998）。原文：“日本人要求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可是执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那些被拉走的华人，……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

[29] 李光耀（1998）。原文：“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一个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

解释是：英语“不只是国际外交场合的共同语，还是吸取科学及技术知识的媒介”；但他同时也强调，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如果只学英文，又是愚不可及的。因为这将使人民脱离自己的文化根源”[30]。1979 年，由李光耀发起的“讲华语运动”，提倡华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李光耀本人早年曾为争取选票，先后学习了福建话和客家话[31]，而在运动发起之后却放弃了方言。在他看来，方言只是地方性语言，而“华语是唯一能团结新加坡华族的语言”[32]。

从本文的分析视角看，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兼具双重功能：对内，它是多元种族国家建构的工具，以英语的超族群性来维系族群的平衡，以母语的传承来安顿文化的认同；对外，它则为华人社会保存了与中华文化圈沟通的语言资本。讲华语运动在客观上降低了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交往的语言成本，为八九十年代以后两国经贸与文化的深度互动做好了铺垫。语言在此成为一种桥梁设施，而这正是“落地生根”之后华人因素转化为对华贡献的典型路径。

（三）从侨乡纽带到国家间合作

在经济层面，中新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是苏州工业园区。1994 年 2 月，中新两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33]，新方财团持股 65%，中方持股 35%，在规划面积约 80 平方公里的中新合作区内兴建工业、商业与居住设施[34]。该项目不同于一般的外商投资：它转让的不仅是资金，更是新加坡在园区规划、招商引资与政府管理方面的一整套治理经验，即新方所称的“软件转移”。苏州园区现已发展为常住人口逾百万的新城区，并长期位居中国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排名的前列。

在政治层面，新加坡长期坚持一个中国立场[35]，并在两岸之间发挥着独特的沟通作用。李光耀自 1973 年起几乎每年访台，1976 年后又多次访问中国大陆，与

[30] 李光耀（2013）。原文：“由于经济理由，英文至关重要，它对新加坡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但是在我们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如果只学英文，又是愚不可及的。因为这将使人民脱离自己的文化根源。”

[31] 李光耀（2013）。原文：“为了打动选民的心，我非得说福建话不可。我暂停了所有华语课，像发了疯似的学讲福建话。……我以客家人的身份参加竞选，许多客家乡亲设宴支持我，我却一句客家话也说不出来，这迫使我开始学客家话。”

[32] 李光耀（2013）。原文：“新加坡华人要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有价值、高素质的语言，这个语言当然是华语而不是方言，华语是唯一能团结新加坡华族的语言。”

[33] 凌翔、陈轩（1998）第六章“悉心培植新中友谊”记载：“从 1992 年 9 月开始，李光耀、吴作栋、王鼎昌等新加坡领导人多次来中国考察和访问，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等多次会见了他们，反复商谈了工业园区项目，最终决定将工业园区建在江苏苏州”。

[34] 参考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www.sipac.gov.cn）：苏州工业园区行政区划面积为 278 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区为 80 平方公里。

[35] 李光耀（2000）。原文：“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

两岸高层均保持密切联系[36]。1993年4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谈”，开启了两岸制度化协商的先河；2015年11月，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议题上达成共识[37]。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体、又与两岸皆保有互信的地位，使其成为两岸高层会晤的首选地。

在人员往来层面，2024 年 1 月，中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协定于同年 2 月 9 日生效，双方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停留不超过三十日[38]。这标志着中新两国走向更加紧密的关系。2011 年 1 月，习近平在会见李光耀时曾评价道：“李光耀先生是我们尊敬的长者，迄今，他依然不懈地推进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我对他满怀敬重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们的双边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39]2023 年 3 月，两国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40]。

综合本节所述，“落地生根”之后的贡献形态呈现出鲜明的双向性：新加坡向中国转移治理经验、提供斡旋平台、便利人员往来；而中国则为新加坡的资本、企业与国际战略提供了空间。贡献的形式从游子对故土的单向馈赠，转变为两个主权国家基于共同利益的互惠安排；华人因素从以“华侨”的身份直接出现，转变为沉淀为语言、文化与信任的基础设施。上述的这些变化，构成了对“反哺”形态的历史性超越。

六、结论

本文以认同转型为线索，对新加坡华人华侨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了长时段的考察。这一贡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侨民反哺”向“族裔桥梁”的结构性转变。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落叶归根”的侨民认同与祖国的政治危机相互叠加，催生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反哺形态，即经济支持、政治声援与教育移植三位一体，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达到了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去殖民化进程与中国国籍政策的调整，共同推动了新马华人完成国家认同的在地化转向，贡献的主体由华侨个人，置换为以华人为主体族群的新加坡，贡献的机制也由单

[36] 据李光耀（2000）记载，1973 年至 1990 年间，李光耀每年都会访台一两次，曾在台北与蒋经国等人会面；自 1976 年起，李光耀亦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先后会见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等人。

[37] 汪辜会谈及两岸领导人会面的相关史实，参考人民网（www.people.com.cn）、新华网（www.news.cn）的公开报道。

[38]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官方网站（sg.china-embassy.gov.cn）发布的协定文本与生效公告。

[39] 引自新华网 2011 年 1 月关于习近平会见李光耀的报道。

[40]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www.mfa.gov.cn）2023 年 4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关于建立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向的馈赠，转化为双向的互惠，治理经验转移、两岸斡旋平台与人员往来便利化，是这一“桥梁”形态的具体表现。

就理论意涵而言，离散族群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态的、本质化的联系，而是随着认同结构与国际秩序的变动而不断重构的历史过程。海外华人研究需要摆脱“贡献”的颂扬性叙述，转而分析贡献得以发生的条件、渠道与限度。

2024 年 5 月，黄循财出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中新两国关系在“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框架下继续前行。新移民群体的兴起与数字时代跨国网络的重组，或将成为考察新加坡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下一个学术增长点。

参考文献

艾利森、布莱克威尔、温尼（2013）。《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原著出版于 2013）
陈达（2011）。《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
陈嘉庚（2010）。《陈嘉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陈嘉庚（2022）。《南侨回忆录》。厦门大学出版社。
崔贵强（1989）。《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大学出版社。
康泰（1971）。《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许云樵辑注）。东南亚研究所。
孔飞力（2016）。《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 2008）
郦道元（2007）。《水经注校证》（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联合早报。
李光耀（2000）。《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联合早报。
李光耀（2013）。《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译林出版社。
李钟珏（1947）。《新嘉坡风土志注释》（许云樵校注）。南洋书局。
林少川（1994）。《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
凌翔、陈轩（1998）。《李光耀传》。东方出版社。
刘宏（2003）。《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
普腊班扎（2016）。《爪哇史颂》（徐明月、刘志强编译）。商务印书馆。
汪大渊（1981）。《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廎校释）。中华书局。
王赓武（1994）。《中国与海外华人》。商务印书馆（香港）。
许慎（1988）。《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颜清湟（2005）。《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大学出版社。
杨国桢（1987）。《陈嘉庚传》。人民出版社。
义净（198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
曾玲（2003）。《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2020）。《习近平在厦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朱杰勤（1990）。《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杰勤（2011）。《华侨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庄国土（2000）。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 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中山大学学报*，（4），110-116。
庄国土（2001）。《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岩崎育夫（1996）。『リー・クアンユー 西洋とアジアのはざまで』。岩波書店。
岩崎育夫（2013）。『物語 シンガポールの歴史』。中央公論新社。
川島真（2010）。『近代国家への模索 1894—1925』。岩波書店。
Leyden, J. (Trans.). (1821). *Malay annals*.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Rush, J. R. (2018). *Southeast Asi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en, C.-H. (1982).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Modern Asian Studies*, *16*(3), 397–425.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00015249
Yong, C. F. (1987).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